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尺牍文献

王 世 伟

一、尺牍释名及尺牍文献的起源

牍，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七片部云：“牍，书版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牍，专谓用于书者。”先秦时《周礼》、《仪礼》中多有版、方之词，皆牍之谓也。当时的版牍多用于表示户籍和名籍。从形制而言，牍与册、牒、契均有所不同：牍多用木质，一尺见方，而册（策）多用竹简，狭长，中间有编连的丝绳；牍与牒虽多用木质，但牍较之牒为厚，牒则为小木札，所谓厚者为牍，薄者为牒；契与牍相类，但粗者为契，精者为牍。由于书牍多一尺见方，故出现了“尺牍”一词。

据现有文献史料的考证，“尺牍”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的太史公传赞：“缙紫通尺牍，父得以后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缙紫救父（太仓公）的故事。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无子，缙紫为其幼女。时太仓公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情急之时，缙紫上书汉文帝曰：“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传记中的“书”与太史公赞辞中的“尺牍”相对，说明尺牍即指书信。《汉书·游侠列传》中有杜陵人陈遵（字孟公）的传记，其中谓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说明当时书信中的书法艺术已为人所重，人们已纷纷将其作为文物艺术品加以收藏了。《汉书·匈奴

传》中曾记载了汉皇室致匈奴诏书的情景，“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这些都是“尺牍”一词出现较早的文献记载，说明尺牍意为用一尺左右木版书写的信札，以后便成为书信的通称。

由于中国古代文字书写材料有木版、竹简、缣帛、纸张等材料，所以古代文献中也用牍、札、简、帖、函、启、尺素、尺纸等名称来表示书信。不仅如此，“书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记、曰上书、曰启、曰笺，自敌以下曰简、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状。其实皆书类也。”（吴曾祺：《历代名人书札例言》）此就尺牍的广义而言，唐宋以后尺牍文集的编纂，其内容范围多局限于同辈相告者或前辈训后者。

虽然尺牍一词至汉代才出现，但尺牍文献至迟在春秋就已经出现了。《文心雕龙·书记》云：“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可见在春秋时期，书信的往来已是十分频繁了。延及汉代，更是出现了专精于尺牍文字的专门家：“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文心雕龙·书记》）

由于尺牍文献的增多，古代还出现了书信样式的指导书，如《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中就有谢元《内外书仪》四卷、蔡超《书仪》二卷、王弘《书仪》十卷、王俭《吉书仪》二卷、唐瑾《书仪》十卷等。保存至今者有唐写本书仪多种，如王重民所撰《敦煌古籍叙录》中即著录有杜友晋撰《书仪》、张敖撰《新集吉凶书仪》二卷。又如《四库全书》经部礼类中有宋司马光撰《书仪》十卷，内容包括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参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二、尺牍文献类目的历史演变

在《文心雕龙》中，曾经把臣对君的上书归入“奏启”类，而将其余的书信归入“书记”类，但在“书记”类中，也有“上书称奏”的内容，如“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即为一例，可见奏启与书记虽分为二类，但其中也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奏启与尺牍难以完全分开，而人们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历代的书目文献中有关奏启的文献就有了不同的分类。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中，有《奏事》二十篇，列于《战国策》之后，可见刘向刘歆父子是将奏启作为史部文献看待的。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在集部文献楚辞、总集、别集、诗集、歌词后，以“章奏”类殿集部之末，陈氏谓：“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别为一类。”这样，章奏文字开始在目录中自为一门，而且是作为集部文献来看待的。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承陈氏之说，也以章奏自为一门，亦居集部之末，与《直斋书录解題》稍异者，《文献通考》章奏类居集部别集、诗集、歌词之后，总集、文史之前。《四库全书总目》以《汉书·艺文志》为圭臬，认为“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四库全书总目》诏令奏议类序），于是将奏议文字，归入史部诏令奏议类。在诏令奏议类中，其中所录的奏议文献有专集和总集之别，其中专集者“皆以奏议自为一集者，其或编入文集之中，则仍著录于集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诏令奏议类专集后案语）。

自春秋以来，尺牍文献日益增多，于是从南北朝开始编纂的文章总集开始，尺牍作为一种文章体裁逐渐成为一种单独的文献类型。南朝梁萧统（501—531）所编《文选》为现存最早一部古代文章总集，其中所收文章体裁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

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等三十八类，其中“书”类中有《李少卿答苏武书一首》等书记，为尺牍专类，其他如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等文章体裁或与尺牍相同，或与尺牍相类。《文选》一书的体例编排，开了尺牍体裁在总集目录中设立专类的先河。清人姚鼐（1731—1815）也曾编有《古文辞类纂》，依文体分为论辨等十三类，其中有“书说”类，与《文选》“书”类同中有异，即“书说”中除收录了书记之文外，也收录了开始盛行于战国之时的应对之词，所谓“说”类文体，较之尺牍，有所不同。而清代曾国藩（1811—1872）也曾辑有《经史百家杂抄》，共析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大类，其于告语门下又细分有“书牍类”，并注曰：“同辈相告者。……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牋、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

唐宋以降，尺牍也多编入别集之中，如唐代刘禹锡的文集《刘宾客文集》中即有书、启等文章体裁。又如《欧阳文忠公集》中曾将尺牍类分为书启和书简类，这就开了尺牍文献在别集目录中设立专类的先河。在明代之前，尺牍往往多编入总集和别集之中，自为一集者少。因此在明代以前，历代群书书目中尚未有为尺牍单独设类者。

自明代开始，尺牍专集开始出现，反映在书目中，就有了尺牍类目。明代嘉靖年间高儒曾就其家藏书编就了《百川书志》，其中集部下细分有“启札”类，这是较早为尺牍文献设立专类的群书目录。清雍正年间，金檀所编《文瑞楼藏书目录》在子部下设立“尺牍”类目，但其将尺牍与古文、骚赋、四六等归入子部，与其他众多书目分类的体例不免相舛。清姚际恒所编《好古堂书目》集部下也设有“尺牍”类目。一些汇编类的丛书中也出现了尺牍专类，如光绪中《申报馆丛书》正集和续集中分别设有“投报尺牍类”和“尺牍类”。民国年间，也有一些书目中列有尺牍类目，如民国十五年（1926）昆山赵诒琛所编《赵氏图书馆藏书目

录》在集部中设“书牋”类。也有一些书目，虽未设立专目，但在集部中收有尺牍专集和总集，如宣统三年（1911）张元济等编《涵芬楼旧书分类总目》于集部设杂著类，收录尺牍等文献；缪荃孙等所编《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于集部下著录有明杨慎撰《赤牋清裁》、明魏大中撰《魏廓园先生尺牋》等尺牍总集与专集。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新一版）是迄今为止书目中收录尺牍较多的一种。该书目于集部总集类下细分有“尺牍之属”，收录了明陈继儒所辑《寸札粹编》等39种尺牍总集与专集，但实际上该书目中尚有不少尺牍文集尚未统归于“尺牍之属”，而是归入了集部别集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并未给尺牍设专类，尺牍文集多归入了集部别集类，如明别集类有明陈文烛撰明万历十三年（1585）张淳刻本《五岳山人尺牋》十七卷等。

三、历代尺牍文集举要

文集中设尺牍类自宋代欧阳文忠公集始，后之编集者，遂于书记外列尺牍一类。至于尺牍的专门文集始编于明季，清代和民国继之。其中有单刻（单抄）者，有汇刻为总集丛书者，有收入别集者，有收入丛书者，兹分别举例如下：

1. 单刻（单抄）例

《五岳山人尺牋》十七卷，明陈文烛撰，明万历十三年（1585）张淳刻本。

《辽中书牋》二卷，明熊廷弼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

《环碧斋尺牋》五卷（又有明刊二卷本和一卷本），明祝世祿撰，明刻本。

《宗伯冯先生尺牋》四卷，明冯琦撰，明末刻本。

《远山堂尺牋》不分卷，明祁彪佳撰，稿本，其内容分为在里

尺牍、致仕归里尺牍、致方外尺牍、致兄及戚仆尺牍等。

《钱牧斋先生尺牍》三卷，清钱谦益撰，清康熙顾氏如月楼刻本。

《李笠翁尺牍》一卷，清李渔撰，清嘉庆六年（1801）许嘉猷抄本。

《魏忠节公札稿》不分卷，明魏大中撰，清杏花春雨山庄抄本。

《魏廓园先生尺牍》不分卷附一卷，明魏大中撰，清抄本。

《藏山阁诗存》十四卷《文存》六卷《田间尺牍》四卷，清钱澄之撰，清抄本。

《曾文正公书牍》不分卷，清曾国藩撰，清薛福成家抄本。

《惜抱先生尺牍》八卷，清姚鼐撰，清陈用光辑，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

2. 汇为总集丛书例

《赤牍清裁》五卷，明杨慎辑，明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又，《赤牍清裁》十卷《补遗》四卷，明吴勉学刻本；又，《赤牍清裁》十卷，明杨慎辑明刻本；又，《赤牍清裁》四卷，明杨慎辑，明抄本；又，《赤牍清裁》二十八卷，明杨慎辑，明王世贞增辑，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本；又，《尺牍清裁》六十卷《补遗》一卷，明王世贞辑，明隆庆五年（1571）自刻本。

《新刊精选古今大家翰牍遗矩》六卷《精选国朝诸先生手翰》一卷，明顾洛辑，《致斋居士手翰》一卷，明顾洛撰、明吴森辑，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吴森刻本。

《徽郡新刻名公尺牍》三卷，明程大约辑，明万历四年（1576）程氏滋兰堂刻本。

《新刊大家通用古今翰墨文宗后集》八卷首二卷，明杨淙辑，明万历六年（1578）金陵锦江书屋刻本。

《苏黄尺牍》八卷，明张所望撰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苏文忠公尺牍》四卷，宋苏轼撰，《黄文节公尺牍》四卷，宋

黄庭坚撰；又，《苏黄尺牍》九卷，明万历刻本，其中《东坡尺牍》五卷，《山谷尺牍》四卷；又，《苏黄尺牍选》八卷，明钟惺、谭元春编，明刻本，其中《苏长公尺牍选》二卷、《黄山谷尺牍选》六卷）。

《历朝尺牍大全》十四卷，明王锡爵辑，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书林周近泉刻本。

《国朝七名公尺牍》八卷，明屠隆辑，明万历文斐堂刻本。

《风教云笺》四卷，明黄河清辑，明万历舒用中天香书屋刻本。又，《风教云笺后集》四卷、《风教云笺续集》四卷，明黄河清辑，明万历舒用中天香书屋刻本。

《评选古尺牍》八卷，明王纳谏辑，明天启元年（1621）刻本。

《尺牍青莲钵》十二卷，明何伟然辑，明天启七年（1627）梨云馆刻本。

《明尺牍谷音》七卷，明汪之琦辑，明崇祯七年（1634）刻本。

《翰海》十二卷，明沈佳胤辑，明崇祯刻本。

《绣梓尺牍双鱼》十一卷又四卷《补选捷用尺牍双鱼》四卷，明陈继儒辑，明金阊书林叶启元刻本。

《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牍双鱼》九卷《补选捷用尺牍双鱼》四卷，明末刻本。

《如面谈》十六卷，明钟惺辑，明冯梦龙订释，明刻本。又，《如面谭二集》十八卷，明钟惺辑，明刻本。

《车书楼选刻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六卷，明项桂芳辑，明王世茂注，明金陵书坊刻本。

《尺牍争奇》八卷，明张一中辑，明刻本。

《尺牍初徵》十二卷，清李渔辑，清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又，《尺牍初徵》十二卷，清李渔辑，《启札初徵》二卷，清汪淇辑，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分类尺牍新语》二十四卷，清徐士俊、汪淇辑并评，清康熙

二年（1663）刻本。又，《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二十四卷，清徐士俊、汪淇辑并评，清康熙六年（1667）刻本；又，《分类尺牍新广编》二十四卷《补编》一卷，清汪淇、吴雯清辑并评，清康熙七年（1668）刻本。

《古今尺牍大全》八卷，清李渔，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抱青阁刻本。

《赏奇堂尺牍》四卷，清陈遇麒辑，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

《凭山阁新辑尺牍写心集》四卷《二集》六卷，清陈枚辑，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凭山阁刻本。

《思园选辑明人尺牍》不分卷，清卫台擢辑，稿本。

《书札两家汇抄》二卷（史忠正公一卷郑板桥一卷），明史可法、清郑燮撰，清抄本，其中史忠正公书札为史忠正公曾孙山清敬所辑，分为家书和遗书；郑板桥书札有郑氏与舍弟书十六通。

《曹李尺牍合选》二卷，清曹溶、李良年撰，清茅复辑，清河涧堂刻本；又，清世德堂刻本。

《归不草堂尺牍》一卷，清吴晋锡、吴兆騫撰，清末吴氏石莲庵抄本。

《明代名人尺牍》，民国邓实辑，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国学保存会影印本。收录有明代尺牍集七种：《有明两大儒（王守仁高攀龙）手帖》、《明十五完人手帖》、《大参陈公手集同人尺牍》、《王文成与朱侍御三劄》、《瞿忠宣公手札及蜡丸书》、《明东林八贤遗札》、《明贤名翰全册》。

《明清十大家尺牍》，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年（1921）所辑石印本，收录明清尺牍十种：明王守仁撰《王阳明尺牍》一卷、明归有光撰《归震川尺牍》一卷、清钱谦益撰《钱牧斋尺牍》一卷、清顾炎武撰《顾亭林尺牍》一卷、清侯方域撰《侯朝宗尺牍》一卷、清尤侗撰《尤西堂尺牍》一卷、清方苞撰《方望溪尺牍》一

卷、清姚鼐撰《姚惜抱尺牍》一卷、清吴锡麒撰《吴穀人尺牍》一卷、清王韬撰《王弢园尺牍》二卷。

《蓬龢所藏尺牍》，民国潘承厚辑、潘承弼续辑，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42—1944）吴县潘氏影印本，其中收录有元明清历代尺牍集八种：《明清藏书家尺牍》，民国三十一年（1942）影印本；《明清画苑尺牍》（附有潘承厚绘《蓬龢遗墨》），民国三十二年（1943）影印本；《元明诗翰》、《瞿忠宣公蜡丸书侯忠节公绝缨书合璧》、《杨忠烈公左忠毅公遗札合璧》、《明季忠烈尺牍》初编、《明季忠烈尺牍》二编、《明季吴中三老手札》，以上六种均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影印本。

3. 收入别集例

《淑艾斋尺牍》三卷，明汪可进撰，明万历刻本（与《公余草就》三卷同刻）。

《兰陔堂稿》十四卷（中有《尺牍》四卷），明杜开美撰，明万历刻本。

《黔南十集》十三卷（中有《黔南尺牍》一卷）明刘锡玄撰，明末刻本。

《湖上草》一卷《尺牍》一卷，清柳如是撰，明末刻本；又，清抄本《柳如是尺牍》一卷、《河东君尺牍》一卷。

《秋声阁尺牍》二卷（与清奚大武撰《古照堂诗稿》一卷合刻），清奚学孔撰，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奚士恂刻本。

《式古堂集诗》六卷《文》三卷《尺牍》二卷，清张云翼撰，清康熙刻本。

《万宜楼书札》一卷（与《万宜楼诗录》一卷《诗联续录》一卷《诗文目录》一卷《联语》一卷合刻），清汪鸣銮撰，稿本。

《曾文正公书札》三十三卷，光绪二年至三年（1876—1877）刊，《曾文正公家书》十卷，光绪五年（1879）刊，清曾国藩撰，收入《曾文正公全集》，清同治光绪间传忠书局刊。

《板桥全集》四卷（中有《板桥家书》一卷），光绪壬辰（1892）上海积山书局原刻石印本。

《春在堂尺牍》六卷，清俞樾撰，收入《春在堂全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经辽疏牍》十卷，清杨承禧辑，清湖北通志局用东洋抄本重雕本，此为明武昌熊廷弼文集，其中卷六至卷十为书牍，熊集的各个版本中，其尺牍收录的多寡也各不相同。

民国汪定执辑民国二十年排印本《慕云集存》中收录有汪定执辑《雁帛鱼笺》一卷。

4. 收入丛书例

《寸札粹编》二卷，明陈继儒辑，收入《格致丛书》，明胡文焕辑，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本。

《明人尺牍》一卷，清黄定兰辑，《熙朝尺牍》一卷，清陈钟原辑，收入《拜梅山房几上书》丛书，清道光十六年（1836）刊。

《明尺牍墨华》三卷，清黄本骥辑，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收入《三长物斋丛书》，清黄本骥辑，清道光中湘阴蒋环刊光绪四年（1878）古香阁印本。

《尺牍新抄》十二卷，清周亮工辑，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颜氏家藏尺牍》四卷，清颜光敏辑，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均收入《海山仙馆丛书》，清潘仕成辑，清道光咸丰间番禺潘氏刊光绪中补刊本。此两种尺牍亦收录于《丛书集成初编》的文学类，商务印书馆辑，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惜抱先生尺牍》八卷，清姚鼐撰，咸丰五年（1855）刻本，收入《海源阁丛书》，清杨以增辑，清咸丰中聊城杨氏海源阁刊本。又，《惜抱轩书录》四卷、《惜抱先生尺牍补编》二卷，收入《惜抱轩遗书》，清光绪五年（1879）桐城徐宗亮刻本。

《申报馆丛书》，清尊闻阁主辑，清光绪中申报馆排印本。《申

报馆丛书》正集中辟有“投报尺牍类”，收录有《翰海》十二卷等；《申报馆丛书》续集中辟有“尺牍类”，收录有《馈贫粮》一卷等，《申报馆丛书》余集中收录有《通问便集》二卷等。

《存友札》一卷，清徐晟撰，收入《豫恕堂丛书》，清光绪中刊本写样本。又，赵诒琛、王大隆所辑1947年排印之《辛巳丛编》中亦收录有清徐晟撰《存友札小引》一卷，与此书名不同。

《书仪断片》、《尺牍残叶》，民国罗振玉辑，据唐写本影印，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民国上虞罗氏影印本。

《写心集》（一名《晚明百家尺牍》十六卷）、《写心二集》（一名《晚明百家尺牍》）二十卷，清陈枚辑，均收入《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襟霞阁主人辑，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935—1936）上海中央书店排印本。

四、尺牍文献的史料和文物艺术价值

尺牍文翰，虽至今无专门目录，但留存于世者也颇为可观，其例已如上述。与诗词赋文相比，尺牍文献在内容、文体、修辞等方面都形成了其自身的特点，保存了重要的文献史料；其独特的书法、用笺、印章、题记、装帧等，又使其具有了重要的文物艺术价值。

1. 尺牍修辞必诚，未可以其别于文而忽之也。

清代姚鼐曾认为，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说明尺牍之体与文章之体有所不同。如《惜抱先生尺牍》八卷中，其论学及为文之宗旨者居多，而这些论述，在姚鼐的文集中已多所论及。但由于尺牍修辞的特点，则可以将尺牍与文集相互参阅，从而有助于深入研究姚鼐的文学思想。清人梅曾亮在《惜抱先生尺牍》序中说：“夫学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浅，先生所论辨既屡见之文集矣。今尺牍所论，虽体制不同而其义则微显，互证可相辅而益明。盖其信于心者深而教人也诚，故或庄言之，或率意言之，其

理未尝不更相表里，无稍有齟齬于其间，此亦足以见为学之不欺。虽无所为作而出之者，其修辞必诚，未可以其别于文而忽之也。”（《惜抱先生尺牍》八卷，清咸丰五年（1855）海源阁刊本）尺牍文字，具有声咳如闻角艺、论文笑言不隔的诚信的特点，正如清人洪锡豫所述：“盖古文体最严洁，一切绮语、谐语、排偶语、词赋语、理学语、佛老语、考据、注疏、寒暄、酬应语，俱不可一字犯其笔端。若尺牍则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见《小仓山房尺牍》六卷，洪锡豫序）正因为是“信手任心”，使尺牍文献体现出直率、真实、本色、客观的特点；也正因为是“无所不可”，使尺牍文献中保留了许多诗文中所没有或难以记载的史实。如明人华亭人冯大受在所撰《苏黄尺牍序》中就曾论述到这一点。冯氏认为，苏黄尺牍，虽单辞只语，散见方册，但人们将其视为凤毛麟角、片玉碎金，争相传藏，“乃其愤世嫉邪、抑郁牢骚之气，往往形于尺牍。正所谓昌言之不得而私之者也”（《苏黄尺牍》冯大受序，万历己丑（1589）刊本）。

2. 尺牍亦德人之雅音。

在古人眼中，尺牍为一时挥翰之文，非关著作，而视诗文为大业，尺牍家言，既非吟咏之音，又异纵横之笔，被列为末艺（参见《尺牍新抄》选例，清道光丁未（1847）《海山仙馆丛书》本；《管注雪鸿轩尺牍》四卷，涤微主人重刻详注雪鸿轩叙，清与洋珍艺书局仿聚珍版印本）。但实际上，尺牍具有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这一点，许多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如清人姚鼐所谓尺牍，“是虽不足言文，然必取材于《昭明文选》及东晋人诸帖，则其词雅训矣”（《惜抱先生尺牍》陈用光序）。清人郭汝骥在《惜抱先生尺牍跋》中引陈石士语谓：惜抱先生尺牍，“此虽随手简牍，而其中论学论文语，开发学者神智，视《归震川尺牍》，有过之无不及也。学者苟能由是而有悟于学则不啻亲炙先生之謦咳矣”（见《惜抱先生尺牍》郭汝骥跋）。在一些古人眼中，尺牍与诗文被相提并

论，认为“尺牍亦德人之雅音”（见《惜抱先生尺牍》梅曾亮序，版本同上）。清人洪锡豫在抄得袁枚尺牍若干读后，感到“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且其中论政论古论文学极有关系，在他人必阑入正集矣”（《小仓山房尺牍》洪锡豫序）。而尺牍虽然是片笺寸幅偶尔酬应之作，“然而其脉长，其源远，其行其止，莫不有自然之势，孤峰秀拔，龙出泰华，异乎雕琢之石也；碧波清浅，朝宗溟渤，异乎搏激之水也。世有知者仁者，往来流览，其遂等诸千仞之冈、万里之流与”（《归震川先生尺牍》二卷，汪绎序，清康熙己卯（1699）刊本）。尺牍的史料价值为人所认识后，尺牍文字便逐渐进入了古人的文集。“自昔名大家尺牍登入文集者，多者十居其五，少亦十之一二。读其文可以参稽其事迹，想见其性情，非仅文辞丽藻供学者摹仿己也”（《管注雪鸿轩尺牍》四卷，涤微主人序）。明人冯大镛曾将苏黄尺牍喻为“五子”之一，以陶冶其性情：乘一小艇、兰亭一卷、古琴一张、襄阳诗一帙、手抄苏黄尺牍，遂呼为五子（见《苏黄尺牍》冯大镛序，版本同上）。尺牍文献内容丰富，其形式有奉者、有答者、有与者、有别者、有复者、有寄者、有上者、有谢者、有慰者、有柬者、有报者、有寿者、有候者、有贺者，不一而足，其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实可以与诗文等量齐观。一些尺牍中保存了书信作者的诗文，而在其文集或总集中并未收录，则可作辑佚之用。

3. 尺牍文献保存不易，考证亦难。

尺牍多同辈相告，其中不无寻常应酬之作，即随手写来，无论是写者还是阅者亦都随手弃去，自存者甚少。以《惜抱先生尺牍》为例，编者陈用光为姚鼐弟子，姚鼐平时自定其文极严，其尺牍无自存者。陈用光为编辑其师尺牍文集，从三个方面加以收集，一是将其师在二十多年中写与其书信皆收藏而潢治之；二是访求与姚鼐有交游之谊者；三是访求先生子女及门人，这样终于汇为八卷。其中有姚鼐先生与人书四首，当初是陈用光于1799年

春在姚鼐先生的住处从书堆中检得的稿纸幸而保存，但姚鼐本人皆不能确切地记忆当年是写与谁了。这样的例子在保存至今的尺牍中并非个别，从而为尺牍的考证带来了一些困难。洪锡豫所编《小仓山房尺牍》六卷的刊刻杀青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当初洪锡豫从袁枚弟子处抄得袁氏尺牍若干，读后颇感内容丰富，而袁枚对其书翰则是弃若涕唾，未免可惜。于是洪锡豫与袁枚争之曰：“先生以四六为外集，其严画古文界限之意，业已了然。尺牍每况愈下，豫岂不知。然齐桓公谓管仲曰，仲父但教我以善，而不教我以不善，我又安知善之所以为善耶。今先生既以严且洁者示人，而不以严不洁者示人，则学者又何由知古文与尺牍所由判别之故哉。”洪氏以机智迂回的方法，最终说服了袁枚先生同意刊刻其尺牍文集，这样才有了《小仓山房尺牍》的问世。

尺牍保存不易，不仅有以上所述人们随手弃去的内因，也有查禁和编选等方面的外因。由于古代文人尺牍中往往有愤世嫉邪、抑郁牢骚之气，所以“当时言官请禁，士大夫不得藏其尺牍，亦几于不得言矣”（《苏黄尺牍》冯大受序）。而一些尺牍文集在编选中，或绝之，或删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有些尺牍文献未能保存下来。所谓“文人聚讼，自古为然，尺牍纷争，于今更甚。自何李倡道于前，艾陈沸腾于后，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讹，一言之异，动生抵牾，论难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犹未知所底者，不过争吐笔铍之飞湍耳。……启门户之渐，造水火之端，酿祸贻讥，莫此为甚，原其所始，未尝不可，两存而并是也，岂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严绝之。……因知是非之无定，毁誉之难明，尊己卑人，概为删逸”。（见清周亮工：《尺牍新抄》选例）。

4. 尺牍的文物艺术价值

尺牍的文物艺术价值主要是指留存至今的尺牍书翰实物，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文献都已成了文物艺术品，其文物艺术价值体现在许多地方，其中包括书法、用笺、印章、题记、装帧等。

以用笺而言，书信专用笺纸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明清两朝和民国年间，书信专用笺纸品种繁多，多趋精致典雅。如《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笺谱》等，更是著称于世。

以书法而言，虽留存于世有众多的碑刻法帖，但书信中的书法艺术也是别具一格，成为古代书法艺术中的重要载体。以书体而言，有时代之异，地区之别，个人之风，而书信中的书法艺术往往有其与其他文献载体有所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征，从而成为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如书信或称为“相闻书”。《后汉书·隗嚣传》：“自今以后，手书相闻。”书信又或称为“行狎书”，因其随手写来，为草就之作，故称。而“行狎”正是书体之名，如《魏书·崔玄伯传》：“尤善草隶行狎之书，为世摹楷。”而行狎书即指行书。这些书信的别称，恰恰说明尺牍与书法的联系。由于行书和草书自由抒情，富于变化，故多为古代书家所用。

五、上海图书馆馆藏明清尺牍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清尺牍约十一万通，其中明代尺牍多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移交上海图书馆入藏，其中绝大部分至今未曾公开发表。这些尺牍在入藏上海图书馆之前，大都已经过了一些初步的整理装裱。近年来，上海图书馆整理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明代尺牍》，共计600通，所涉作者约300多人，馆藏的明代尺牍大多已包含其中。

这些未刊尺牍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和文物价值，其中记载的众多史料可与正史、方志、谱牒相互印证，可以作为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新发表的重要史料。

韩雍（1422—1478），字永熙，曾先后巡按江西、历官兵部右侍郎，左佥都御史、右都御史等，曾平定南方。其在与内翰岳先生知己阁下书中对明代的政治有所评述：“雍处此碌碌三四年，才不适时，因人成事。无奈群小交谤，宦况绝无，旦夕只思求一退

归，休吴山吴水间，养亲终余年耳。”对于明代政治的黑暗，韩雍心灰意冷，“临书怅然”。

在群小交谤、宦况绝无的明代政治中，也有一些百姓拥戴的地方官，何孟春即是一例。

何孟春（1474—1536），字子元。曾在河北河南任职四年，“去之日，百姓送者倾城”，何氏于“愧叹之余，遂成二律”：

髻白纷纷拥路尘，愧予无语慰吾发。绿杨系马烟中景，芳草停车两后春。杯酒酹时情极重（汴民间以酒酹地，云谢马足），斗香焚处意还真（民以大斗贮灰插香数把焚路傍，鳞次以送。盖旧俗有之，予何以当）。粮差不用重相问，老泪留倾汴水滨。

心切循良仰昔贤，欲希鸾凤谢鹰鹯。中州分守曾三道（大梁、河南、河北），左辖参知[勿]四年（壬申八月升任，乙亥二月改官）。那有设施遗惠爱，每惭攀卧为留连。多情父老期重见，祇益人言重我愆。

从以上诗句中，也可以看到史称“直言敢谏”的何孟春与百姓之间的情谊，也可以了解明代“以酒酹地”、“斗香焚路”的旧俗。

吴宽（1435—1504），字原博，侍东宫，在馆阁三十年，于府中秘事了解甚多。其书中即有唐寅（1470—1523，字伯虎，因科场泄题案遭斥谴，遂绝意仕途）当年泄题案之史料。书中云：“唐寅因程学士卖题事被华给事中奏劾在内，尚监在锦衣卫。寅虽无银买，然因知情。如得脱便好，未知何如也。”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亦作璧），字徵明，以字行。其与子重尊兄书中谓：“南京许翁死，其子陞取翁平日服用之物分题为挽诗。区区分得簪冠，一向因循，不曾作得，今其家在此催取，欲烦代作一首。盖连日有事，且老钝不能出妙思，故具赖于聪明。千万勿拒，明后日拜领。璧顿首拜。”据此书可知当时有取

逝者平日服用之物分题为挽诗之习俗。

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号枝山。做为明代吴门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当年祝允明与同好交往甚多，并有“打喜会”之文化活动。祝氏在其与秋田贤弟太史书中云：“昨闻有桑间之遇，如何如何？诸兄弟俱欲过宅作打喜会，幸毋他出。”

林瀚（1434—1519），字亨大。其与大参徐年兄大人书中提及明代有送帕之风俗：“外有薄帕二方，少伸贺意，惟莞留为爱。”此外，明代还有食物相赠之风俗。李应桢（1431—1493），名甦，字应桢，以字行。其与廷表贤弟书云：“盐鸭子并淡者便中为买得二百枚应用，蛤蜊酱、蛭，些少寄惠，……。”徐霖（？—1449），字子仁。其与秋涧尊亲执事书中云：“蛤蜊数只，京梨十枚，奉献寿堂太君，乞为转致。”据此也可作明代民间饮食之研究。

古代尺牍有一定之体式，如与某某人书之称呼多置于书末，但也偶有置于书前者。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筑室阳明洞而自号阳明子。其与大元老砺斋老先生书中首署己名：侍生王守仁斋沐顿首再拜启上；次题与某书：大元老砺斋老先生大人执事；再次为书信内容；书末再署己名：守仁惶恐激切再拜启上。这一书信体式与众不同，也可作为研究古代书信体式之例。

明代尺牍多为书法名家所撰，其中如明初的徐霖、李应桢，明代中叶之后的“吴门派”书法代表人物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以及王守仁等，明代末期的董其昌、邢侗、米万钟等，这些明代的书法名家的作品在尺牍中均有所反映。其篆楷行草，俱入品格，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图书馆